

武当山道家河村民歌集



李重超

主 编

李征康
屈崇丽

金 殿

天柱峰

朝圣门

三天门

小莲峰

分金岭

金童峰

百步梯

学苑出版社

《武当文库》总序

王 超

武当山雄踞华中，俯瞰四塞，峰崖奇秀，殿阁嵯峨，林木幽深，清流延迥。钟鸣鹤舞，仙境与人世谐趣；流霞飞星，物候因岁时轮回。海内景仰，闻名遐迩。

山之有名，不唯风光绮丽，更重人文精神。武当古陆，自古生代寒武纪后出露沧海。从生命起源初始阶段海洋脊柱动物“直角石”化石的发现，到旧石器时代远古人类打制的石器、新石器时代多处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遗址的科学考察，表明武当山是早期步入生命进化和人类文明里程的地区之一。上古三代和春秋、战国时期大量文物、遗址的发掘，叙说了武当山下、汉水之滨诸多方国部族昔日的辉煌。自秦汉时起，这里因山名而置武当县、武当郡，武当山地区作为北上中原、西控川陕、东进荆楚的战略要塞和军事壁垒，在历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方面发挥出独特作用，给连接黄河水系和长江水系的汉江流域以深刻的印象。以儒学为主流的经典文化、封建帝王的宫廷文化、地主士大夫的雅文化、中下层群众的民俗文化、以道教为代表的宗教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在武当山区川流积蕴，南北交融，东西荟萃，形成地域特色鲜明的名山文化。方圆八百里武当，其自然景观兼有泰山之雄、华山之险、庐山之秀、青城之幽，而其久远历史、灿烂文化、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人与自然亲和的造物神奇和家园意趣，却在华夏诸多名山中鲜见。或许，这正是万千游人香客和中外专家学者追慕武当的难解情结。

武当山是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地，武当山下的十堰人民首先有责任研究它。对武当山的研究、宣传工作，以前做的不少，成果颇丰。但面对新时代、新形势，应当做得更多更好。武当研究，我认为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科学求实的方法，以文明演进为主脉，沟通传统与现实，联系物质与精神，展开多门类、多层面、多视觉的深入研讨，剖析武当文化的内涵和特征，阐释地域文化与华夏文化整体之间的关联、流变与演进，探寻弘扬武当文化与推进地方两个文明建设的良好途径，古为今用，为现实服务。

以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武当研究人员为基础，联合市内外相关专家和研究人員，分别就历史、文学、宗教、旅游、艺术、民俗、考古、武术、医药养生等门类设立科研机构，开展研究活动，在实施高校“产学研”一体化和学院社会化、特色化、多科性发展战略中，开始了有益的尝试。武当研究院的科研活动开展以来已有多项成果问世。把这些成果编纂成集，汇成丛书，以便推进整体研究工作，加强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于是建立武当文库势成必然。祈望武当研究求实求新，成果多多。祝愿《武当文库》与时俱进，蔚成大观，为高校和地方的论坛文苑再添清音、再播新绿。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谨识

序 一

李宪生

武当山不仅有旖旎风光、宏伟建筑、传统武术和严整道场，还有清越雄劲、敦厚纯朴的民歌。这歌声从山坡田畴飘来，从灶台柴扉飘来，从堂会赛场飘来，从亘古唱到现时，从宇宙唱到村院，响彻八百里武当群山。主峰西麓被誉为“汉族民歌第一村”的丹江口市官山镇吕家河村，就是武当民歌世代承传的典型代表。

武当民歌是一座无尽的文化宝藏。仅吕家河村，近年来文化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就采集到民歌一千多首，记录曲调90多首。这个村180余户、740多人，能不重复唱歌两小时以上的有85人，能唱千首以上的有4人。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六七岁的孩童，个个会唱，人人能歌。歌谣有历史掌故的咏叹，也有现实生活的歌颂；有伦理道德的阐释，也有乡风民俗的铺陈，题材广泛，内容清新，曲调优雅，兼融四方，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逐步形成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

以吕家河村为代表的武当民歌的集成，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背景。武当山绵延于汉水中上游南岸。《尚书禹贡》载：“蟠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巫至于大别，南入于江”。汉江作为中国“江、河、淮、汉”四大名川之一，是一百万年前我国远古人类发祥地，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我国古代文化元典之一的《诗经》，集录了咏吟汉江的不少诗篇；仅《国风》中的《周南》、《召南》两部分就有歌颂、赞美汉江流域和汉江南部地区人民生产、生活和劳动、爱情的诗篇20余首。例如总纂者和作者之一周宣王时期太师尹吉甫，就出生在武

当山南麓的房县青峰。春秋末年孔子周游列国，曾在汉水流域和淮河流域之间的许多地方讲学，他是否游历过汉水无确切的记载，但却留下与孟子以汉江民歌为引喻的志趣高洁的语录，孟子曰：“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汉水，随着时间长河流淌，在它 17 万平方公里流域的版图上，掘起座座历史文化名城，涌现众多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和文化名人，演绎了无数动人的历史事件，为中华民族文明史写下了辉煌的篇章。这是武当山区民俗民间文学赖以生长、繁荣的深厚沃土。

武当山自西周迄明清，历朝历代均有道家和道教代表人物隐遁山林，讲经布道，承传仪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道教文化在这里流布深广。武当山古代建筑从唐皇室敕建五龙祠及太乙、延昌二寺始，历代均有增建修缮之举，到明朝初年达到鼎盛。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派遣 400 多名京城官员组成武当山宫观营建指挥部，调集近 30 万军民工匠，历时十一年，建成武当 9 宫 9 观共 33 处建筑群。作为皇室家庙，明成祖及明朝各代皇帝除派遣内廷重臣和省级官员到武当山充任提督提调，还从全国选调 400 多名高道充任武当各宫观的监院住持。此外，明皇室每年都派遣大臣贡送银两、器玩、经书典籍，带上宫廷乐班艺人朝山进香。与此同时，武当后山的大片田地作为明朝廷的“官山”赏赐给武当山道观作为后勤供应基地，五龙庄、新楼庄等庞大的道教庄园散布其中，南来北往的朝山香客，西进东出的游方道众，大多栖身留居于此。漫长的建设历史和庞大的布道活动，使武当山成为从中央到地方众多人士川流不息的聚集地，各种思想、宗教、文学艺术和民俗民风的融汇地。各方人士、各种思想文化的汇聚，使武当山区的民歌呈现出地域和社会层面的广阔性、内容和形式的多样性、丰富性，演唱风格的兼容性。

武当山吕家河村民歌集

我特别要提到的是，在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武当山区作为北通豫陕、东控荆襄的军事要地，备受党中央关注，成为不少有识之士接受革命文化熏陶的重要地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贺龙率红三军挺进鄂西北，创建了以武当山、房县为中心的鄂西北根据地，官山镇及吕家河村等许多地方均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抗日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时，我党领导的许多抗日救亡团体和文化机构及一批知名人士如臧克家、姚雪垠等集聚武当山草店一带，在抗日救亡的热潮中从事文化宣传活动。解放战争中，李先念、王震率中原部队突围西进，强渡丹江，穿越武当山地区。王树声率部创建以武当山为中心的鄂西北游击根据地。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和左翼文化名流、文艺机构的到来，传播了“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的优良传统，为武当山区民歌注入了新时代的革命因素。

武当山区民歌，为武当名山增色，为中华民族文学艺术宝库添辉，是武当文化光彩夺目的篇章，其挖掘整理和继承发扬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师生，深入山区，深入群众，同田间劳作采集歌谣，共月光油灯参辩调式，辛勤采风，严肃工作，将1031首民歌（含曲调部分76首）成书付梓，其精神可嘉可赞，其成果可喜可贺。值此《武当山吕家河村民歌集》出版之际，应编者之邀略述数言，聊以为序。

2001年10月

序 二

刘锡诚

记得 1999 年的夏季，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教授、民间文艺搜集者李征康同志打电话给我，说在武当山下发现了一个民歌村，他在这个小村子里搜集了大约 1500 首短歌，15 部长歌。要我去看一看。武当山地区十年前曾发现了故事村伍家沟，现在又在同一个地区冒出来一个民歌村，这个消息着实令我高兴。到了 9 月底，我接到了十堰市所属丹江口市委召开“中国武当民歌学术研讨会”的邀请。尽管武当是旧游之地，还是毅然放下手中正在写作的文稿前去参加。那次会议的内容，主要是围绕着会议主办者提供的、由当地搜集者（主要是李征康）在吕家河村搜集的一册传统民歌的打印稿。其中既有抒情的短歌，也有叙事的长歌，而且都有曲调，都能演唱。应邀参加会议的人，来自民俗学、音乐学、宗教学等不同学科，根据会议提供的材料，大家一致肯定：由于历史（明永乐年间修建武当宫观的各地 30 万民工流落此地）、地理（地处汉水以北、秦岭以南，十分封闭）、人文（南受楚文化、北受秦文化以及本地道教文化与土著文化的影响）等诸种原因，吕家河村的文化积淀极为深厚，能保存下来如此丰富的传统民歌资源，且其曲调的丰富多样，显示出其文化的多源性、兼容性和开放性，在文化学上极富价值。

会议结束后，我们在会议安排下去了吕家河村。这是一个隐藏在武当山后山皱褶里的小山村，道路虽经稍事修整，也还是七拐八弯绕道才能进得去。在村子里听了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男女村民演唱的各类民歌。亲眼所见、亲耳所听，与其说印证了会议研讨的结论，勿宁说是启发了我的思考。古人说的“礼失，

求诸于野”，这条有关礼俗和文化发展嬗变的规律，在这里再次得到了验证。古代中原的若干歌曲及其类型，在漫长的历史途中，在产地中原逐渐消失了，被遗忘了，如今，却在这个相对封闭的小山村里被保存下来，它们的生命得到了延续。仅这一点，不是值得我们特别珍重吗？

我对李征康在吕家河村记录的 15 部长诗特别感到兴趣。在会上发言时，我着重就这个问题说过一些粗浅的见解。我重提胡适先生当年的一个著名论点：“故事诗（Epic）在中国起来的很迟，这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很少见的现象。要解释这个现象，却也不容易。我想，也许是中国古代民族的文学确是仅有风谣与祀神歌，而没有长篇的故事诗，也许是古代本有故事诗，而因为文字的困难，不曾有记录，故不得流传于后代；所流传的仅有短篇的抒情诗。这二说之中，我却倾向于前一说。‘三百篇’中如《大雅》之《生民》，如《商颂》之《玄鸟》，都是很可以作故事诗的题目，然而终于没有故事诗的出现。可见古代的中国民族是一种朴实而不富于想象力的民族。他们生在温带与寒带之间，天然的供给远没有南方民族的丰厚，他们须要时时对天然奋斗，不能像热带民族那样懒洋洋地睡在棕榈树下白日见鬼，白昼做梦。所以‘三百篇’里竟没有神话的遗迹。所有的一点点神话如《生民》、《玄鸟》的感生故事，其中的人物不过是祖宗与上帝而已（《商颂》作于周时，《玄鸟》的神话似是受了姜嫄故事的影响以后仿作的）。所以我们很可以说中国古代民族没有故事诗，仅有简单的祀神歌与风谣而已。”^① 对于胡适先生的这个论断，我们大可怀疑。在许多少数民族中流传的史诗和叙事诗姑且不谈，近五十年来，我国民间文学工作者至少在鄂西北和江南吴语

^① 胡适《白话文学史》第六章《故事诗的起来》，上海新月书店 1928 年 6 月初版。

地区两个汉族地区相继搜集到了数量不少的长篇叙事诗。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宋祖立、吕庆庚在湖北崇阳、蒲圻一带记录搜集的汉族长篇叙事诗《双合莲》，长达 1500 行；同时期还搜集了一部反映农民起义的长诗《钟九闹槽》。钱静人于 1952 - 1953 年在江苏南部搜集到一部长达 275 行的叙事吴歌；到八十年代，江苏、浙江和上海的民间文学工作者又相继搜集出版了《沈七哥》《五姑娘》《孟姜女》《赵圣关》《林氏女望郎》、《鲍六姐》等 30 余部长篇叙事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江南十大民间叙事诗》一书^①。这说明，汉民族不是不富有叙事传统，而是没有搜集起来，任其自生自灭，在传承中失传了。如今又在武当山下的吕家河村搜集记录了 15 部长篇叙事诗，怎能不叫我高兴呢？这 15 部长诗固然不一定每部都是佳作，都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但同样我也确信，其中必有好诗在，它们无疑丰富了我国民间叙事文学的宝库。这个事实证明了胡适先生早年提出的那个结论或假设，是证据不足的，应予修正；中国文学史也应该改写。

吕家河的民歌与社会，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和媒体报道的热点。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的学者们成立了吕家河村课题组，对刚刚掀开冰山一角的吕家河村的民歌，展开了全面的调查和深入的研究。他们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田野调查和案头研究，这部《武当山吕家河村民歌集》就是他们的成果之一。在这部书的作品部分，包括了现在还在口头上流传的千余首、约二十万行各类民歌（包括短歌、长歌和曲调）。这些传统民歌，就其内容而论，反映了明代以来不同时

^① 关于民间叙事诗的搜集，此前我已在《民间文学：五十年回顾》中较为详细地写过了，参见张炯主编《新中国文学五十年》第 545 页，566 页，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

代、不同地区的社会生活风貌和文化传统，除了属于生活民歌、私情民歌类的大量作品外，还有反映了民间信仰的民歌，如哭丧歌、祭祀歌等，也还有相当数量是属于本地文化传统的民歌（如已经失传的武当山莲花落）以及道教色彩较为浓厚的民歌。在吕家河村听当地的男女农民们演唱民歌时，我看到他们用来为长篇诗歌伴奏的打击乐器是用一个支架顶在肚子上的一对小锣鼓，在其他地方没有见到过这种形制的锣鼓，也没有见过如此演奏，就显然属于当地传统而非外来文化。

吕家河村不过是汉水以北、秦岭以南这个极富独特性的区域文化地图上的一个点。以我粗浅的知识，这里的文化，既受了楚地文化的深刻影响，又与楚地文化不完全是一回事；既受秦地文化的深刻影响，又不是秦地文化。以吕家河村的民歌为基点，课题组所作的调查和研究，也许是初步的，但它是前无古人也是开启来者的。也许他们还会把自己的视野扩大到整个的社会研究。不管怎样，这部选集的出版，无论对鄂西北社会、民俗、历史、宗教信仰等文化传统的研究，还是对汉民族文化移动与交融的探索，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我没有过细研究吕家河村这次民歌田野调查的全过程，但我相信，对在一个村子的范围内流传的民歌作如此全面的调查研究，为我国的记录民俗学创造了一定的经验。远的没有考证，在我从事民间文学工作的四十多年里，就我的记忆所及，类似的个案调查研究，曾经有过一例，即1959年5月，北京的学者路工、张紫晨与江苏省的学者周正良、钟兆锦等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江苏省常熟县白茆村民歌的调查，并出版过一本《白茆公社新民歌调查》（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遗憾的是，那次调查的重点是新民歌，虽然也涉及到民歌的历史传统，但难免受当时流行

的“左”的思想的影响，毕竟有失片面。^①而今天对吕家河村民歌的调查，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里所做的一次全面的历史的调查，不仅资料搜罗全面宏富，指导方针也是遵循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我希望这次田野调查的成果，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其所获得的资料，能为中国记录民俗学提供科学的、翔实的资料。

记录民俗学是民俗学的一个分支。钟敬文先生在阐述民俗学的结构体系时说，中国的民俗学应由三个子学科组成，即：理论民俗学、记录民俗学（即通常所说的民俗志学）和历史民俗学。^②对于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中的中国民俗学学科体系来说，这三个子学科当然是缺一不可的。钟先生把理论民俗学放在了第一位、把记录民俗学放在了第二位，其实理论民俗学与记录民俗学是相互依存的。诚然，理论民俗学是重要的，没有理论体系的民俗学，就如同俗话说的“盲人瞎马”，不独不能有效地指导记录民俗学的开展，甚至也失去了学科生存的地位和发展的方向。（但也应指出，我国的民俗学理论，至今还是远未完善的，特别是在方法论上，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从理论来自实践和理论是实践的总结与升华的观点看，一定的民俗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又有赖于记录民俗学的开展和成就的取得。没有民俗事象的广泛记录与汇集，不独不能进入理论研究的层次，甚至使民俗学本身失去了任何学科的意义。这就是说，记录民俗学永远是民俗学学科的基础。从这样的角度看吕家河的调查，其意义也就不言自明了。

① 不久前，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陶思炎先生在大同市召开的2001山岳文化研讨会上与我相遇，送给我一片由江苏音像出版社出版的《白茆山歌（传统篇）》光碟（没有出版年代），其中收入白茆传统民歌53首。我把它看成是四十年后当地文化界为当年《白茆公社新民歌调查》调查组偿还的一笔欠账。

② 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第44-48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哈尔滨。

武当山吕家河村民歌集

《武当山吕家河村民歌集》就要付梓了。课题组的朋友们嘱我为这部书写一篇序言，盛情难却，勉为执笔，写上数语，权作序言。

2001年9月3日于北京

序 三

王 超

(一)

这部展现在读者面前数十万字的《武当山吕家河村民歌集》是以李征康教授为代表的一批教育工作者，数年不怠耕耘的结晶。有人要问，出版这样一本民歌集有什么价值，就我的理解，首先是它的历史价值。吕家河民歌有久远的渊源，据李征康教授研究，吕家河一带早在春秋以前，就盛行民歌。唐代唐中宗李显被废为庐陵王曾流放于房州、均州（武当山所在地），形成了以歌消愁，以歌解疲的风俗传统。明代明成祖征集近 30 万民工修建武当山道教宫观，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民工们不仅营造了气势博大的道教宫观，而且传播了大量的各地民歌。在吕家河民歌中，存有不少明清民歌的遗响，是不足为奇的。从地理位置上讲，吕家河地处古代秦楚的边缘地带，秦楚文化积淀丰厚，秦腔楚曲，丰富多彩，在其内容上也深深地烙下了历史的印记。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其形成往往是无数代人集体创造的结晶，是由众多的亚文化体融合而成，吕家河民歌作为一种亚文化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正象刘守华教授所说的那样，吕家河民歌“歌曲内容是汉民族历史文化的活标本”。

其次是研究价值。据课题组调查，吕家河村 749 人中，民歌手有 85 人，占总人口的 11.3%。在一个汉族村落里，为什么有如此密度的民歌歌师，而民歌内容的历史时空跨度如此之大，民歌腔调如此之多，保护传承如此之久长。要求出上述之疑解，的确有许多值得专家学者们认真深入研究的课题。如：（1）随着

文化传播手段、传播形式的多样化、现代化民歌衰退步伐在日益加快，吕家河至今存在的民歌盛行现象为音乐界理论研究提出什么样的启示；（2）民歌村具有什么样独特的民俗生态体系，怎样保护这独特的文化生态；（3）民歌村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4）如何挖掘、整理、传承、发展、推陈出新；（5）民歌村的美学价值和美学意义在哪里等。

第三是推陈出新的价值。出这样一部民歌集，本身就内涵着挖掘、保护、传承之意，怎样来发展就得推陈出新。民歌村的所有意义和价值都在于她的自然而然的纯朴性，因此，我们推陈出新的基本原则，只能是在保护、研究其本来面目的基础上来考虑她的发展。民歌集的出版只是走了第一步，第二步就应该是出新了。只有出新方能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解这些丰富多彩的民歌；只有出新方能产生辐射效应，让更多的人接受，从而能更有效的传承。怎样出新，可以做下列几方面的工作：（1）可筛选出具有代表性的曲目，对其歌调内容进行提炼，对曲调进行加工，在保留其纯朴的特质的基础上，融入现代音乐理念，使之更加脍炙人口；（2）有重点地推广一批曲目，通过一定的形式让她走上当今的文艺舞台，成为我国民歌百花园中的一个“亮点”；（3）进一步挖掘、整理曲谱，条件成熟时还可以出版吕家河民歌曲集；（4）建议十堰市政府把民歌的推陈出新纳入到十堰市建设生态旅游城的发展规划中去。武当山吕家河民歌作为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特殊品种，要让其持续发展，只有同当代经济建设捆绑在一起，与武当山旅游紧密结合，让民歌借助于旅游这一载体，更好地展示自身的价值。

（二）

武当山吕家河村民歌蕴藏量极大，这次收集整理出版的就有1031首，尽管如此，也只能说是一少部分，可见往后要做的工

作还很多，任务相当重，还需要课题组的同志们作出不懈的努力。

这次出版的民歌集，就其民歌表达的内容主题来分析，编者把955首民歌（不含附有曲调的76首民歌）分成了13个大类，第一类劳动歌，有13首；第二类生活歌，有105首；第三类仪式歌，有34首；第四类丧俗歌，有311首；第五类情歌，有224首；第六类历史传说歌，有24首；第七类盘歌，有37首；第八类儿歌，有67首；第九类民间叙事诗，有4部；第十类莲花落，有100首；第十一类谜语歌，有32首；第十二类急口令，有3首；第十三类猴戏，有1部。

从内容上对民歌进行分类，是一种简捷明了的方法，符合人们的思维习惯，容易被人们接受。但就本集在内容归类上是否十分合理，这种归类方法是否是最贴切的一种方法，我认为还是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假若能从民歌曲调上加以分类，似乎更能反映出吕家河民歌的文化内涵和她的兼容性。当然，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开始做了，从编者们对有曲调的800多首民歌腔调所进行的初步分析归类情况看，吕家河村民歌的曲调有18类，54种，典型腔调76首，其中，有剪剪花、踏腔（又叫阴歌）、小调、蛮腔（又叫四六句）、儿歌、山锣鼓（又叫阳歌）、坤腔（又叫硬四锤）、四平腔、桃腔（又叫八岔）、秧歌调、孟姜女调、武腔、锣鼓调、倒尖、渔鼓调、陕北道情、曲剧唱腔、猴戏调等。

（三）

进一步挖掘、整理、研究武当山吕家河村民歌，不断推出新的成果，应作为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及本课题组追求的目标。现代高等学校把服务社会作为第三职能，服务社会是全方位的，我们必须寻找一个理想的切入点。挖掘、整理、研究武当山吕家河村民歌资源作为一项文化建设工程，应视为十堰市精神文明建设

的重要内容，这对于繁荣地方文化事业，丰富武当山旅游的文化内涵，扩大十堰市的知名度具有促进作用，这是一项最具有文化品位和发展潜力的服务社会项目，理应得到重视和支持。

进一步做好挖掘、整理、研究武当山吕家河村民歌工作，对带动学院人文社科学科建设也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在“十五”计划里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建设好民俗学，使之成为学院随车辆工程之后，又一特色学科。要实现这一目标重在建设。首先，要寻找一个载体，这个载体就是目前围绕着武当山文化所确立的一系列研究课题，包括：武当山民俗文化研究；吕家河民歌村民民俗文化研究；伍家沟故事村民民俗文化研究；武当山诗词研究；武当山旅游资源调查、开发与研究；武当山旅游精品线路设计与研究；武当山旅游产品的设计与开发等。其次，要围绕着特色学科建设要求开展扎扎实实的研究工作。有了载体只是解决了“过河”的工具，能不能到达彼岸，还得靠参与这项工作的同志们齐心协力、同舟共济。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也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只能躬下身子埋头苦干，长此以往，日积月累，才能确立自己的优势。第三，通过科研的实际锻炼，造就出在本学科有一定影响的学科带头人和学术梯队。实践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近几年人文社会科学系一批年轻学者在民俗文化的研究上已初露锋芒，他们从沸腾的社会生活中吸取着丰富营养正茁壮成长。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继出版《武当山吕家河村民歌集》之后，还会有新的成果奉献给社会，奉献给读者。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吧！

2002年8月22日